

“拾荒老师”和她 2000 多个娃

一位九十六岁新党员的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赵仁伟、林苗苗、毛伟豪

在北京友谊医院,时常能看到一位老人,满头银发,手拄拐杖,步履稳健。96岁的她,仍坚持在科研工作第一线。

李桓英,世界著名麻风病专家,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她,在去年底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于入党,老人说:“我觉得自己终于合格了。”

对于入党后的新生活,她说:“这个年纪了还能工作,相当于活了两次。”

“90 多岁还能做点工作,没白活”

平时,李桓英早上8点上班,常常比同事来得早。一个夏日炎热的午后,在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记者再次见到了她。

聊上几句,就发现老人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而且不失率真的个性。“我很高兴,90多岁还能做点工作,没白活。”她说。

办公室里,有一张插着许多三角旗的贵州地图。在从事麻风病研究的30余年间,李桓英跑了云、贵、川7个地州的59个县,这里曾是我国麻风病的高发区。直到2015年,她还曾前往云南回访。

“全世界麻风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对李桓英的评价。

尽管荣誉满身,李桓英的日常生活简单朴素,每天除了单位和附近的家,就是在医院的食堂吃饭,下班后有时去小超市买水果。

“回到家,我喜欢看《参考消息》,看电视上的新闻节目,有时听听自己喜欢的古典音乐CD。”她指着身上的T恤说,“这件穿了好几年了,我觉得挺好。”

“她有一颗赤子之心,对事业特别执着。”她的科研秘书袁联潮告诉记者,到现在,老人一直关注国内外麻风防治最新动态,并联络美国专家一起搞科研合作、培养学生。

从半路出家,到医学大家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传染性皮肤病,重者可以致残。在我国麻风病防治史上,李桓英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实际上,她参与麻风病研究却是“半路出家”。

上世纪40年代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1950年李桓英成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工作7年卓有成效后放弃了世卫组织的续约邀请,离开已在美国定居的双亲,于1958年底回到祖国,从事皮肤病研究。

1978年底,李桓英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钟惠澜建议她做麻风病研究,这一年,她已58岁。

在很多人即将退休的年纪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李桓英欣然接受了任务,开始了与麻风病的“不解之缘”,并向领导提出要“下到一线去,到麻风村去。”

去“麻风村”的山路难行,李桓英经历过多次车祸骨折、翻船事故,蚂蟥叮咬吸血,但都没有让她止步。每到试点的“麻风村”,她和病人一起吃饭,不穿隔离防护服为病人检查,帮助大家减少恐惧心理。看到困难的病人家庭,她也总是慷慨解囊。

1983年,李桓英带着从世卫组织申请来的新药,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偏远的3个“麻风村”试点的“短程联合化疗”,两年多后服药的47名患者的临床症状全部消失。

回忆往事,李桓英说:“治好麻风患者带来的由衷的喜悦,不是任何酬劳所能代替的。”

“短程联合化疗”在我国推广后,年复发率仅为0.03%,远低于国际组织小于1%的标准,极大减少了我国麻风病患者数量。这一方法于1994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

李桓英主持的《全国控制和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策略、防治技术和措施研究》获得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她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医德楷模等诸多荣誉。

党的同龄人,党的新血液

一生为医学研究默默付出的李桓英,去年“搞了个大事情”。2016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桓英教授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当月,李桓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入党申请书上,李桓英这样写道:“在多年的社会生活和医疗工作中,我深刻领悟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也正是在党的培养、支持和帮助下,我为广大麻风病患者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又给了我很多荣誉和鼓励。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事业奋斗终生!”

在各级党组织的关心支持下,2016年12月,李桓英与医院年轻的医务工作者一起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去世后,身上不能披上一面党旗,那会遗憾的。”李桓英说,“入党更增加了我对自己所选道路的信心,并引以自豪。”

“李桓英教授是一位老专家,也是我们党的新血液。”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辛有清说,李桓英把荣誉和金钱看得很轻,把人民的健康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她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和大写的医德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宝贵财富。

新华社北京电



▲4月25日,潘玉莲在位于新疆喀什疏勒县的“爱心课堂”里带着学生背诵诗歌。新华社记者李京摄

25年,2000多个孩子从这里走出去。他们有的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有的已经成为医生……

坚持、真诚、和善的“奶奶”

每到黄昏渐近,潘玉莲的精神头都会好起来。

下午5点多,她开始不时地看表,简单梳理一下头发,打开小课堂的木门,卷起已经灰白褪色的布帘。

刚过6点,潘玉莲就走出去倚在大门边。不久之后,门前这条路会变得热闹起来,放学的孩子打闹着向潘玉莲的小课堂跑来,扬起的尘土混合着说笑声。

“老师好!”五年级的苏麦耶领着一年级的妹妹走进来。

孩子们陆陆续续到齐,把作业本交到潘玉莲手上,她坐在教室门口的凳子上批改作业,左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红一黑两支笔。

教室外面,学生从小到大排着队,有的孩子手里捧着《唐诗三百首》默背,等候即将到来的检查。

潘玉莲迅速地批改着作业,给满意的粘上红色的笑脸。

孩子们一个个进来领回作业本,小课堂很快坐得满满当当。

喀什当地课外补习班的费用一个月少说也要三四百,别人劝她象征性地收些学费。

潘玉莲说:“进了我的门,就是我的娃娃,哪有跟自己娃娃要钱的?”

她把家里最大的一间房腾出来,改成现在的小教室,自己吃饭、睡觉都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墙旧了就拿宣传画贴一贴,旧家具凑合着用,不同的是,这里一分钱不收,还给孩子们管饭、发文具;这里只有潘玉莲一个老师,辅导5个年级几十个孩子的语文、数学、外语。

在潘玉莲屋里,最新的东西就是堆满书桌的字典、辅导书,还有一沓厚厚的A4纸装订本。那是潘玉莲找打印店帮她做的表格,上面登记着自己教过的每个孩子的信息:姓名、家长联系方式、本人表现、家长意见……

一年级的艾尼凯尔今天的“上黑板”测验终于通过了,略带哭腔地和老师潘玉莲说再见,被早已等候在外面的妈妈领回家。

“家长都支持我,从不为早点下课向我求情。”潘玉莲说。

“潘老师教孩子有自己的一套法子,上过她小课堂的孩子就是不一样。”镇泰小学的老师说。

“哪有什么法子,我一天师范没上过,又没干过老师。”潘玉莲笑着说,“全是笨办法,手抓着写,一遍不写写很多遍。”

和学校教学不一样,她的小课堂更舍得在孩子身上花时间,她自己更像一位严厉的奶奶。

“天底下哪有笨娃娃,一遍遍讲,肯定能教会。”和孩子在一起时,潘玉莲特有耐心。

刚来的娃娃都怕上课严厉的潘老师,但待久了,他们就能体会到她的好。

一个雪天的清晨,苏麦耶的妈妈像往常一样骑电动车送她和妹妹来潘玉莲家上课,不料途中轮胎打滑,3人被甩到了路边,电动车也摔坏了。

潘玉莲看到母女浑身被雪水打湿的模样,赶紧拿毛巾帮忙擦干。她告诉孩子的母亲:“以后中午不用来接孩子了,留下来和她一起吃饭。”后来,离家远的学生都被留了下来,所有人的午饭都由潘玉莲来承担。

慢慢地,社区的左邻右舍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便自发给“爱心小课堂”送饭、馍馍、鸡蛋,有什么送什么。

23岁的艾比布拉·吾叔尔是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大三的学生,他清晰地记得,17年前在潘玉莲的小课堂里,自己因为“上黑板”写不出来哭过鼻子,也是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影响一生的品质。

“潘奶奶的那种坚持、真诚、和善,到现在都一直影响着我,让我想要去不断地改变自己,让我变得越来越好。”

每逢寒暑假,那些考学出去的孩子回到疏勒,总要赶紧回小课堂去看望潘玉莲。

“他们回来后教我英语,还跟我一起教

课,会跟现在的娃娃讲很多自己的体会。”潘玉莲说起这些一脸骄傲。

“下半场”人生 别样精彩

“爱心小课堂”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也开启了潘玉莲别样的人生。

年轻时不幸的婚姻,给潘玉莲留下一个儿子。为了养家,她把孩子丢给父母,外出打工,做过餐饮、跑过运输,甚至做过泥瓦匠。1992年,打工的积蓄在一场意外中化为乌有,潘玉莲回到老家。

50岁那年,潘玉莲的小课堂“开张”,开启了她的“下半场”人生。25年,教与学,陪与伴,成为潘玉莲和孩子们之间微妙的彼此依赖。

为了教好娃娃,只读过高中一年级的潘玉莲开始了对自己的严要求。巴掌大小的本子扉页上,写着“每天背三首古诗”,里面抄录着古诗,随手翻开背诵、温习。这些年她一直坚持自学,谈论语、学英语,偶尔还练练毛笔字。

有一次,她差点就放弃了小课堂。

1998年,潘玉莲收到一封邀请函。年少时,潘玉莲在学校系统学习过俄语,乌鲁木齐一所学校特意想聘她任教,邀请函言辞恳切,所开报酬可观,她清楚,这是改变困顿生活的机会,年纪再大一点,外面的世界就不再属于自己了。

经过一番思考和挣扎,潘玉莲来到乌鲁木齐。

很快,手机铃声不断响起,“潘奶奶你到哪里了?”“奶奶你家里怎么没人?”“奶奶今天我考了第一名……”电话那头是七嘴八舌稚嫩的声音,提醒着她遥远的地方有一群孩子需要她。

“我那时才发现,和孩子们在一起,才算过好生活,说什么我都要回去。”潘玉莲毅然辞职返回疏勒。

7年前的一天,潘玉莲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等待着孩子们放学。远远地,看到孩子背着书包走过来,脸上带着调皮的笑,走到她面前,刷地一下从背后拿出一大盒鲜花,齐声喊着“生日快乐”。

原来,潘玉莲一次无意间说出了自己的生日,孩子们悄悄记在了心里,“谋划”了一场惊喜。

这盒花,已经放干,被潘玉莲珍存在家里唯一的橱子顶层。

2017年元旦,在“爱心小课堂”上课的38名孩子自发带来了彩带、气球、拉花,把教室装扮得喜气洋洋。几个调皮的小男孩给潘玉莲捡来的流浪狗琪琪也带上了花环。“这也是我们的家,要把它打扮漂亮,和潘老师一起过节。”

小教室斑驳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的水彩画。今年六一前,用领到的A4纸和彩笔,阿依来热画了蓝天、绿树和拿着气球的小姑娘,底下写着一行字:潘老师,我们爱您。

她常给人说,要是没有这群娃娃,没有给娃娃上课的盼头,都不知道漫长的白天怎么挨过去。

夜深,随着最后一个孩子跟着家长离开,潘玉莲合上“教室”那咯吱作响的木门,过道的灯灭了,院子安静了。潘玉莲回到自己10平方米的小屋。这就是她的一天。

潘玉莲家的窗台上,放着一张5寸的半身黑白照。那是她最喜欢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八九岁的潘玉莲穿着领口绣花的衬衣,清秀的眼神清澈倔强。

她教过的娃娃都说:“潘老师最美最好……”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9日电

引了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音乐爱好者。第二年,就有了50万粉丝。

2015年,艾呢组建了创业团队:除了他,还有4位维吾尔族小伙伴,3位汉族小伙伴。

41岁的新疆“情歌王子”穆明江·阿不力克木是第一和“苏巴提”签约的维吾尔族歌手。他开心地说,“‘苏巴提’抵制盗版,还号召我的粉丝一起阻止盗版。合作之后,我的专辑销售量超过3万张。以前,我的专辑没卖出5000张。”最近穆明江将自己的新专辑《男人的哭泣》的网络发布权交给“苏巴提”。

如今,“苏巴提”的合作歌手有来自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的50位,其中维吾尔族占了九成。这些歌手几乎集中了当代新疆最有影响力的中青年歌手。

“我每天都会点开苏巴提,听自己的歌,也听别人的歌。”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维吾尔族小学音乐老师艾力·阿克苏巴在苏巴提上发布了《母亲一直都在》等30多首歌曲,歌曲总播放量超过20万次。

在艾力·阿克苏巴看来,新疆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维吾尔族音乐继承了中国汉唐时西域音乐和阿拉伯、波斯乐的艺术传统,又受伊斯兰教音乐的影响,因此新疆音乐有非常深的底蕴和民族、地域特色。

“在‘苏巴提’这个新疆音乐传播平台上,你可以领略到《十二木卡姆》的风采。”艾力·阿克苏巴说。《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一种大型传统民间古典歌舞音

乐,汇集歌、诗、乐、舞、唱、奏于一身,于2005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艾力的祖父和母亲是《十二木卡姆》的传承人。

苏巴提刚刚完成了最新版本的升级工作。这些技术工作在浙大校园内一个免费提供给学生创业空间里完成。这个叫“元空间”的学生创业孵化器,估计有1000多平方米,聚集着50多个学生创业团队。苏巴提公司在这里拥有五个工位。

因为学习和创业的忙碌,今年春节学校放假,艾呢第一次没有回家。他给父亲订了一张从乌鲁木齐到杭州的机票,这也是父亲第一次乘飞机。

“父亲虽然不太懂我的项目,但能用手机点开苏巴提了。”艾呢说,因为创业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他的毕业设计没有及时完成,他决定延期一年毕业。

艾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小妹和小弟还在上小学。大妹妹考上了新疆艺术学院播音主持专业。上一周,她和同班同学做了一个爱情故事有声读物,在苏巴提发布。

“收听率超高,一共8篇,每篇收听超过10万。”艾呢说。

每年接受政府和大学一万元补助的艾呢,相信自己将来能回报母校。他说,去年春天,“苏巴提”获得了天使投资50万元。因为这位投资人看好“苏巴提”对文化交流的推动和促进。

眼下,艾呢正在寻找第二轮投资。他的计划是,投资人投资200万元,占5%,公司估值达到4000万元。



▲2017年1月,艾呢在浙江大学自修。(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来到上海。

“如果没有好的机遇,我不敢想象我能来到大上海读高中,4年后又考上中国最好大学之一的浙大。”艾呢说。

2013年,艾呢考进了浙大计算机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浙大一向创业氛围浓厚,在这里他第一次听说“创业”“天使投资”,萌发了创业梦。

“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音乐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经过一番思考,艾呢决定将自己的专业和音乐结合,在社交平台微信上做一个维吾尔族音乐公众号。

2014年下半年,艾呢注册了“subat 苏巴提”微信公众号。在维吾尔语中,“苏巴提”是“年轻人英俊潇洒”的意思。很快,苏巴提吸

新华社记者何军、荣启涵、白佳丽

新疆今夏要比往年热不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喀什更酷暑难耐,似火的骄阳把大地烤得滚烫。

晌午时分,潘玉莲为因病落残的儿子和上高中的孙女准备好了饭菜后,拎着白色编织袋上街。

潘玉莲75岁,由于双腿老迈且患有旧疾,在行走时只能拖着碎步,眼睛却不时环顾四周。遇到垃圾堆,她便驻足留步,顾不上腥臭认真翻检,把能卖几分钱的瓶瓶罐罐收起来。

和一般的拾荒者不同,潘玉莲衣着整洁,头发梳理得很好。走在大街上,卖水果的妇女、裁缝店的师傅、烤馕的汉子,都会叫她一声“潘老师”。

这个“拾荒”老太太为何成了人尽皆知的老师?记者来到她那座有着60多年历史的黄色土坯房前,推开那扇油漆斑驳的红色木门,寻找到了答案。

陋巷响起读书声

1992年,在外地打工的失意,让潘玉莲打定主意回家乡——喀什地区疏勒县疏勒镇。

家里的老房子没变,黄色外墙没有记忆中那么鲜艳,就是在这老房里,潘玉莲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维吾尔族,这也让她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精通两种语言的人。

一天,潘玉莲见到邻居两个孩子在门口玩耍无人看管,就把他们领回来,一边做饭一边教他们识汉字。几天工夫,孩子真的学会了不少。

她所在的新市区社区,维吾尔族家庭占到三分之二。“这些娃娃家里多半是低保,父母打工忙到很晚,文化不高辅导不了功课,成绩就这样落下了。”

潘玉莲在外面闯荡过,她知道,语言不通,孩子的发展会被限制住。于是,她萌生了办小课堂的想法。一张小茶几、一块小黑板,刚开始只有两个孩子,后来慢慢变成5个,越来越多……

通常,上午是潘玉莲的拾荒时间,出去走一大圈或许能捡到十几个瓶子,每个3分钱。

收废品的周萍总会再添几角钱给潘玉莲。她知道,这钱“潘老师”是花在孩子们身上的。

卖废品的钱被她一角一块地码好,装在塑料袋里收起来。

隔一段时间,她会到杂货店买些新本子、铅笔,还有小红花贴纸。最贵的是每月35块钱一箱的瓜果茶,再买包米糖。

有些孩子放学过去没饭吃,她就烧水泡冰糖花果茶给他们就着啃饭。“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娃娃。”

潘玉莲每月只有300多元的低保,还要照料因病致残的儿子和一个上高中的孙女。她自己常常只有中午做顿饭,晚上要教课到深夜,烧点开水泡馍馍吃就对付了。

喀什当地课外补习班的费用一个月少说也要三四百,别人劝她象征性地收些学费。

潘玉莲说:“进了我的门,就是我的娃娃,哪有跟自己娃娃要钱的?”

她把家里最大的一间房腾出来,改成现在的小教室,自己吃饭、睡觉都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墙旧了就拿宣传画贴一贴,旧家具凑合着用,不同的是,这里一分钱不收,还给孩子们管饭、发文具;这里只有潘玉莲一个老师,辅导5个年级几十个孩子的语文、数学、外语。

在潘玉莲屋里,最新的东西就是堆满书桌的字典、辅导书,还有一沓厚厚的A4纸装订本。那是潘玉莲找打印店帮她做的表格,上面登记着自己教过的每个孩子的信息:姓名、家长联系方式、本人表现、家长意见……

“90后”新疆小伙:“让音乐传递美好”

本报记者张奇志、余靖静

24岁的维吾尔族小伙子艾呢·阿布来孜,从中国最西部的新疆喀什农村,来到中国最东部的繁华都市杭州,一边上大学,一边运营一家互联网公司。

这位就读于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大四学生,另一个身份是杭州苏巴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苏巴提)的创始人兼CEO,正致力于用互联网技术更好地传播维吾尔族音乐。

“我希望让音乐传递美好。”艾呢告诉记者,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手机上的微信公众号subat或者下载手机应用程序Subat FM,听到一万多首少数民族歌曲,其中维吾尔族歌曲占了八成以上。创立3年多的“苏巴提”,如今的粉丝数已超过100万。这已是互联网世界最大的维吾尔族音乐平台。

1993年,艾呢出生于新疆喀什伽师县卧里托拉克镇库车买买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多年来,中国政府采取让内地相对发达省份对口援助新疆。教育援疆是其中一种。2000年起,新疆每年都选拔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初中毕业生进入内地城市的高中学习。现在,有14个省市45个城市的93所高中开办有新疆班,共有在校生3.6万人。

2009年,艾呢第一次远离家乡,去5000公里外的上海读高中。父母和他乘拖拉机来到镇里,又转乘公共汽车,送到县城告别。艾呢跟随老师到了喀什市,和30多个考上内地高中班的同学会合。在喀什住了一晚,第二天坐了30个小时的汽车到乌鲁木齐。接着,他们整整乘了72个小时的火车,横穿中国东西,